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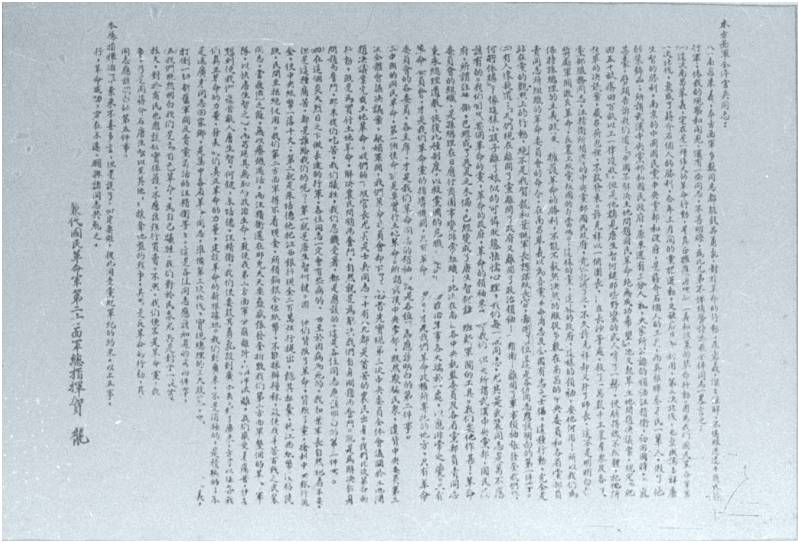


惊天动地第一枪

编者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军事博物馆，现有文物21万件套，一级品1793件套，收藏、研究、陈列了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历程和人民军队建设成就的文物、实物、文献、资料，是十分优质的党史军史学习资源。学习时报与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合作，推出“文物与军史”系列文章，介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重要实物和图片，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这些展品背后的故事，回顾党缔造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



南昌起义部队以贺龙名义发布的布告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使用的德国造M1896式警用短管毛瑟手枪

“革命成功，定在不远。”这是南昌起义后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的一句话，也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心中永恒的信念，他们坚信革命低潮的严冬即将过去，革命高潮的春天终会来临。这份文告长560毫米，宽410毫米，在岁月的侵蚀下，纸张早已泛黄，左下角缺失，中间也有零星残洞，但2000余字的文告全文依然清晰可辨。展柜里还陈列着一把意义非凡的德国造M1896式警用短管毛瑟手枪，枪身刻着“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的字样。当年，朱德就是带着这把枪参与并见证了南昌起义。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筹建陈列室，从朱德处征集此枪。1959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如今，泛黄的文告与手枪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中，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南昌城头那一声枪响，带我们回忆那黑暗中奋起的力量。

1927年的春夏，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党反动派举起了高高的屠刀，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中，不掌握武装力量的共产党人犹如待宰的羔羊，在逼迫中不断退步、忍让，中国共产党命悬一线，中国革命危在旦夕。

在这危急关头，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勇敢地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前往九江，与抵达九江的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共产党员叶挺一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后因发现张发奎已站在汪精卫一边，7月24日，在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上，初步决定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领导南昌起义。由于朱德原指挥过深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当时

驻扎在九江、南昌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的一些高级军官是朱德的旧部，这种特殊的身份，为朱德做好起义前期准备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朱德奉命先行从武汉返回南昌后，通过各种关系了解了南昌市及其周围地区兵力部署，精心绘制出标明军事要点的南昌市区图，为起义做了积极的准备。

7月26日至27日，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与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及第10师等部分别到达南昌。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根据朱德关于南昌敌我情况的汇报，对起义有关

事项进行了部署。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不仅着手制定了详细的南昌起义计划，还一手搭建了南昌起义领导机构。在任命起义部队总指挥前，周恩来与当时手握一半起义部队，但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进行谈话，贺龙明确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党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干”。28日，周恩来代表前敌委员会任贺龙为起义部队总指挥，刘伯承任起义部队军事参谋团参谋长，与贺龙共同拟定作战方案，为起义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月31日，前敌委员会

在第20军军部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起义时间为8月1日凌晨4时。午后，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名义下达了作战命令。

起义前夕，朱德摆下筵席“盛情”款待南昌驻军的两个团长，并按计划拖住他们。晚上9点多，一个副官跑来报告说贺龙部一个副营长告密，称共产党要发动起义，两个团长闻讯即走。朱德不得不赶紧向起义总指挥处通报此事，周恩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当即决定起义提前2个小时进行。凌晨，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以

及朱德率领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生等2万余人，以颈系红领带、左臂扎白毛巾为标志，在南昌城头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大部分的敌军被消灭，余下皆被缴械投降。经此一战，南昌重要据点均已被起义军拿下，全歼南昌守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南昌城头上的红旗高高飘扬，黎明的曙光已然来临！

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谭平山召

开了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了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革命委员会决定，设立参谋团，任命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为参谋，领导军事斗争；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贺龙代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2日，第25师组织起义的聂荣臻和周士第，率领驻九江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第74团1个连到达南昌加入起义军行列。之后，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并按照中共中央原定南征广东再进行北伐的计划，陆续撤离南昌，挥师南下。但由于起义部队力量薄弱，在南下途中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周恩来、贺龙等分别经香港去了上海，继续革命斗争。起义部队一部分在董朗等的带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继续革命斗争，另一支在起义后进行整编，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在朱德率领下坚持斗争，转战湘南，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产党领导的星星之火，终将成为燎原之势。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起点，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里程碑，也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帷幕，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



王恩茂：两次主政新疆的开国中将

□ 杨方圆



王恩茂，江西永新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党和军队卓越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先后两次主政新疆，以大爱无疆的情怀，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壮丽篇章。

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1934年7月，红六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王恩茂随部队奉命撤出根据地，开始了漫漫长征路。1936年2月，红六军团攻克贵州省黔西、大定、毕节等县。在近20天的时间里，王恩茂与部队指战员一道在街头、广场，演戏、唱歌、跳舞、写标语、讲演，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没有大量纸张，大家就用废纸、毛草纸代替。墙壁、门板、竹片也成为标语牌；锅灰、木炭成为墨汁的代用品。经过宣传，越来越多的群众认清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群众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红军的人数逐渐增多。9月，红六军团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4座县城以及陕西凤县、略阳县部分地区。为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王恩茂和部队指战员一面御敌，一面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地方革命武装，建立各级政权，打击地主土豪，扩充红军2000余人。

1937年11月，王恩茂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与第359旅第717团进至山西雁门关、忻县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王恩茂带领工作队深入群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不当亡国奴、跟着共产党

走、跟着八路军干的革命道理。经过广泛深入的工作，群众被发动起来，很快出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青壮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可喜局面。同时，工作队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

从1940年12月开始到1942年8月，第359旅各部相继开进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副政委王恩茂和旅长王震率先垂范，上山开荒、下田种地，战斗在第一线，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真正做到领导生产“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动手动脚”。为了解决“当兵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种地的”“在后方生产不如在前方打仗光荣”等思想问题，王恩茂领导部队开展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工作。使全体指战员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以及边区人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支援战争；搞大生产运动，是为了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坚持抗战和保卫边区。缺少开荒工具，王恩茂就发动大家想办法解决。有的上山伐树加工成材，到几十里外的村镇换取工具；有的到河防两岸搜集敌人轰击边区的炮弹片，有的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寻找废铁；有的潜入敌占区扒铁轨，锯断后打成工具。

1943年5月6日，王恩茂在《解放日报》发表《三五九旅的开荒工作》的文章，全面介绍开荒经验，使第359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第359旅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使昔日渺无人烟、荒山野岭的南泥湾，成为人们争相参观的“陕北的好江南”，为边区军民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典范，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出了巨大贡献。

革命岁月立下显赫战功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破环国

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调集30万军队将中原解放区5万余人包围在湖北宣化店地区。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军区部队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第2纵队第359旅政委王恩茂和旅长郭鹏指挥第359旅随右路军行动，历经千辛万苦，于9月27日回到延安。第359旅南下时有5060人，中原突围后减员2917人，集体成建制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指战员仅有1893人，加之后来零星归队人员共计2200余人，为夺取革命胜利付出沉痛代价、作出巨大贡献。9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大会，欢迎第359旅将士归来。毛泽东说：“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个长征。将来，你们还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的城头上去！”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陕北解放区。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叫嚣“三个月消灭陕北共军”，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西北野战兵团依据敌情、地形，决定在青化砭地区打一场伏击战。3月23日，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王恩茂召集各旅政治部主任布置战时政治工作。24日，司令员王震与王恩茂率领第2纵队进入青化砭伏击阵地。25日，国民党军第31旅旅部及1个团进入伏击圈。随着信号弹的发射，我军立即如猛虎下山冲向敌群，2小时就将敌军解决，未有一人漏网，打了一个干净彻底的歼灭战。青化砭战役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彻底歼灭国民党军的第一仗，极大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下达进军兰州、歼灭马步芳部的作战命令。8月11日，第1兵团第

2军政委兼党委书记王恩茂与军长郭鹏率部出甘谷、武山，一路解放陇西、漳县、渭源、会川、临洮、康乐。22日，占领临夏。临夏国民党守军未战即溃，一部被歼，大部逃散。彭德怀在兰州前线得到此讯，大声叫好。临夏的解放，粉碎了马步芳企图从我军侧后夹击的计划，保障了第一野战军主力围攻兰州5个军左侧的安全，增大了马步芳军右翼威胁；第2军攻占临夏后，矛头直指马步芳的老巢西宁，迫使他从兰州抽调部队增援西宁，对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起到极大配合作用。

谱写民族团结壮丽篇章

1952年6月，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他领导下，新疆及时更改含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某些地名；提倡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增强民族团结；认真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切实纠正存在的问题。王恩茂认为，在新疆开展工作，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十分重要。他强调要以培养少数民族优秀分子入党的组织建设和以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干部队伍建设，采取多种方法，大力推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锻炼和选拔工作。

从1954年开始，新疆县处级以上少数民族干部被分批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进修。随后，王恩茂又建议中央党校开设学制四年的民族干部理论学习班。此后，中央和国家部委所办高等院校、中央团校等也相继开设新疆民族班，为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和后备干部。王恩茂不仅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而且十分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少数民族干部的才干，工作上压担子、给任务；经常与少数民族干部倾心交谈，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因此，他被少数

民族干部亲切地称为良师益友。

195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王恩茂等人来到和田地区的于田。当王恩茂听到一直想去北京亲眼看看毛主席的维族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再三要见他们时，专门到了库尔班·吐鲁木家里。王恩茂鼓励他好好生产，并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设法让你到北京去一次。”经过王恩茂的安排，1958年6月28日，75岁的库尔班·吐鲁木随新疆全国农具展览会参观团来到北京，作为新疆劳动模范代表在中南海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并合影留念。从此，这一珍贵历史镜头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民族团结、热爱劳动的生动写照而载入史册。

1981年，王恩茂从吉林省重返新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走遍新疆86个区县，每到一处，都和农牧民进行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心中想得最多、抓得最紧的是南疆各地、州农牧民脱贫致富和北疆牧民定居等问题。他反复讲：“要想办法搞好新疆的建设，发展速度要力争比较快，比较实在，要使各族人民都能真正得到实惠，一定要把使各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当成想问题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提出要把“五好”（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居民点）建设当作建设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通过“五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机械作业、统一灌水、统一重大技术措施、统一农田基本建设）赋予“五好”建设新内涵，创造性实现了新疆的好居民点工程、富民安居工程以及安居兴牧工程。

王恩茂心系新疆、奉献新疆，真正做到了想新疆之所想、急新疆之所急、干新疆之所需。2001年，王恩茂在北京去世，家人遵循他的遗愿，把骨灰安葬在乌鲁木齐市燕儿窝烈士陵园，使他实现了不负“永远住在天山脚下”的党中央嘱托，至死不离新疆、永远与新疆各族人民在一起的郑重承诺。